

ZXFK 史海钩沉

□ 丁英顺

育才学校在红岩村

抗战胜利后，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创办的私立育才学校迁至重庆化龙桥红岩村办学，与中共中央南方局比邻而居，谱写了育才学校在红岩村的光辉篇章。

艰难办学

1945年秋，陶行知从红岩村女主人饶国模手中租借到原国民参政会及其附近的几栋房屋，并于1946年初，陆续将育才学校迁移至红岩村办学，由此结束了育才学校过去六年散居各处的局面。1946年7月，陶行知因劳累过度猝然离世，育才学校艰辛办学之路再添坎坷。消息传来，全校悲恸。为继续陶行知未尽的事业，学校在新校长马侣贤和党支部书记廖意林的带领下，发起“爱校运动”，号召“每一个同学都要爱护学校，帮助学校”，以渡过难关。

育才学校在合川草街子时期就曾多次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打压和排挤，迁到红岩村后，则经常有特务在学校四周窥探。除了被严密监视，1947年学校还遭受了一次正式搜查。据校友石正宽在《国民党军警特务搜查红岩村育才学校》一文中回忆：3月1日傍晚，国民党军警特务来到红岩村，对学校进行了搜查，查得非常仔细，连每个座位和墙壁都再三摸擦，尤其是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送给学校的那几把椅子更为重视，搜查了近7个小时，最终一无所获。

虽然没有找到任何违法或“反动”的证据，国民党当局仍以育才学校没有立案就擅自招生，把学生当成政治活动工具为由，逼学校要么立案，要么迁离，要么予以取缔。在持续逼迫下，1947年4月，学校在马侣贤的带领下开始分批迁沪，仅剩小学部4个班和初中部2个班继续留在红岩村办学，成为育才学校重庆分部。

1948年，川东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廖意林也被迫转移，重庆分部再遭打击。危难之际，原育才教师、陶行知的得意门生孙铭勋（中共党员）临危受命，开始全面负责分部工作。孙铭勋接手时，重庆分部已是极度困难：上海校本部无力再拨发经费，经济来源几近断绝。为此，学校不得不进一步收紧开支，倡导节衣缩食；继续开展草街子时期的自主生产运动，全校师生一起开荒种菜、担煤挑水、洗衣做饭。

红岩村时期，育才重庆分部不仅得以保存，而且有所发展。1949年春，学校先后增设社会组、教育组、戏剧组、绘画组，学校人数增加到170余人。加上与饶国模所办的红岩小学合并，育才焕发出生机。此外，育才还积极支援其他学校的建设，如王朴创办的莲华中学，韩秉枏、陈尚芳创办的私立建国小学，都曾得到育才学校的援助。

星火传承

育才学校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共北碚中心县委分别在建立了党支部，校内的革命氛围一直很浓厚。周恩来对学校寄予厚望，始终关心和支持着育才。迁址红岩村后，育才师生得到南方局更多的关怀和教育。

学校经常邀请南方局、新华日报社的同志到校给师生作报告。邓颖超应邀到校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何其芳受邀专题介绍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延安文艺界的发展和变化情况；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柳混作关于解放区教育情况的报告；《新华日报》编辑部主任熊复作国际国内形势分析报告。这些讲座和报告，对育才师生影响深远，强化理论素养的同时，增强了师生们的革命斗争意识。1946年2月1日，育才学校举行春节联欢会，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应邀出席。文艺表



育才学校位于红岩村的旧址——原国民参政会会址(资料图片)

演结束后，周恩来发表讲话，充分肯定陶行知在人民教育事业上的巨大贡献和育才学校的办学方向，鼓励同学们“努力向人民学习，为大众谋福利”，指出“虽然现在还有一个育才学校，将来新中国成立后，要办很多很多像育才这样的学校，让全国的孩子都受到好的教育”。

同时，南方局有活动也会邀请育才师生参加，如办事处的周末晚会就常有育才师生的身影。育才学校还有4名学生被抽调到中共代表团工作。1946年3月，代表团为叶挺举办出狱欢迎会，陶行知与部分师生应邀出席，音乐组还表演了节目。叶挺也应邀到育才学校参观，并发表讲话，鼓励学生们“要坚定地走革命道路”。

1946年5月，南方局、中共代表团东迁南京。搬迁前夕，周恩来指示，南方局迁离后，将办事处全部家具、图书等物资赠送给育才学校，并嘱咐孙铭勋等地下党员：“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都要把育才学校坚持下去，只要你们把育才学校支持存在下来，就是完成了你们最大的任务。”

育才学校的两个党支部在皖南事变后合并，由廖意林担任支部书记，受南方局领导，先后由凯丰、徐冰负责联系。南方局东迁后，交由中共四川省委领导，由何其芳负责联系。1947年3月，四川省委被迫撤返延安后，支部暂时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后经多方努力，6月下旬，廖意林与江竹筠取得联系，开始接受重庆市委的领导。

周恩来离开重庆后，一如既往地关心着育才学校。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周恩来得知红岩村的育才学校经费出现严重困难，辗转从香港寄来800块银圆，帮助学校渡过了艰难岁月。

历练成长

在红岩村的革命熔炉里，育才师生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投身民主运动，在斗争中结出累累硕果。陶行知是这队鸿雁的头雁，坚持战斗在革命前沿。1945年12月9日，重庆各界在长安寺举行“一二·一”惨案死难师生举行追悼大会。陶行知率100余名学生前往祭奠，号召“教育文化界人士起来共同战斗”。他在当天致夫人吴

树琴的信中写道：“然后再到长安寺去祭昆明反内战被害烈士，也许我们不能再见面，这样的去，是不会有痛苦，望你不要悲伤。”平安归来后，他将此次斗争概括为“预备死而未死，今后尚有为民族、人类服务之机会”。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迫于人民的压力，不得不做出和平民主的假象，举行了重庆谈判，又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其间，在陶行知带领下，育才师生竭尽全力，为和平民主奔走呼号，难免成为特务盯梢和迫害的重点对象。1946年2月10日，较场口事件发生后，育才学校被污蔑为破坏会场的“暴徒”。为揭露真相，陶行知带领育才师生与特务针锋相对。教师林子藩为驳斥“站在主席台前的育才学生用铁棒、石头等武器打伤与会人员”的指控，特地写作《为孩子们申述》一文发表在2月11日的《新华日报》上。同版还刊有一篇名为《深有所感》的文章，以一封特务队员的来信，披露较场口事件实际上是特务分子精心策划的一场阴谋。

1947年初，重庆爆发抗议美军暴行运动，育才学校再次积极投入斗争，并成为重庆学生抗暴联合会的骨干力量。在中共四川省委的领导下，学校专门组织了抗暴文艺宣传队，制作宣传画、传单、蜡版等各式宣传品，创作了《抵制美货》等宣传歌曲，在街头表演方言剧《哪个办》《王大娘扛缸》等剧目，以重庆学生抗暴联合会的名义，四处宣传，在社会上引发强烈反响。

此外，育才师生还深入农村开展斗争。为响应党关于“到解放区和农村去”的号召，学校专门做了宣传动员。学生们纷纷要求到农村去，掀起深入农村斗争的热潮。文学组的苏觉、刘子林、唐仲芳等深入铜梁，开展“三抓”“四抗”斗争；许智伟、郭一帆、徐行健等教师率领学生深入武隆组织农民运动；陈尧楷、徐永培、徐相应等去往华蓥山地区参加武装斗争；还有一些同学奔赴解放区和游击区参与战斗。很多同学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红岩英烈胡芳玉、陈尧楷、杨华友、游中象、王有余都是其中的典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庆市政府同意育才重庆分部与育才容中合并，迁往谢家湾，改名“重庆育才学校”，育才学校在红岩村的办学历程由此结束。

ZXFK 文心史意

□ 缪士毅

折柳寄情

在北京冬奥会闭幕式上，80名舞者走出一幅“垂柳图”。365名各行各业、不同年龄的普通人手捧柳枝，汇集在场地中央，以这种方式，演绎中国人传承千年的“惜别怀远”和“折柳寄情”，令人难忘。

我国文化源远流长，“送别”的方式多种多样，其中不乏文化意蕴，“折柳送别”就是个中之一。《诗经·小雅·采薇》中就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之吟唱。隋朝的《送别诗》：“杨柳青青著地垂，杨花漫漫搅天飞。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显露了离别的伤感。柳与“留”谐音，“丝”与“思”谐音，民间以柳丝丝依依来表达“留恋相思”，形成折柳赠别之俗，一是寄托依恋难分之情，二是祝愿亲友如柳般强健，不论到哪里，都能生长茂盛，开花结果。

相对折柳赠别，唐代文成公主远嫁松赞干布时，则特地从长安带去柳树苗，以表达对故土的依依惜别，并亲手将带去的柳苗栽植于拉萨大昭寺前。从此，后人称此柳树为“唐柳”，也有“公主柳”。

提起折柳赠别，自然让人回想古代长安的灞桥。灞桥是古时进出长安的必经之路，灞桥周边杨柳垂堤，柳丝依依，人们折柳赠别，依依相送，有的挥泪告别，有的长揖挥别。此情此景，至今仍为人们娓娓道来。折柳赠别，曾牵动了不少文人墨客的情感，唐代诗人杨巨源的诗句：“水边杨柳曲尘丝，立马烦君折一枝。惟有春风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宛若一幅送别图，在诗人眼中，河边垂堤杨柳，勾起他这个将行之人的依依不舍之意，于是停下马来，请送行人帮他折一枝杨柳吧，只有春风最懂得珍惜，仍然多情地向手中已经离开树干的杨柳枝吹拂。宋代诗人王十朋在《咏柳》诗中写道：“紫牵离恨别绪，以示永不相忘。明代陆娟的《代父送人还新安》：“诗人行送诗中常有的伤感气氛，写得欢快明朗，借杨柳表达了友人的良好祝愿。

折柳赠别也触发了画家的灵感。自古迄今，历代画家描绘的《送别图》中就有杨柳的身影，如清代画家汤怡汾《石城送别图》，就是一幅再现晋人于金陵城西石城门外送别情景的画作，画面中河畔碧柳婆娑，柳丝摇曳，象征着众人相送的眷恋之情。

来时迎客松，去时送别柳，这是北京冬奥会带给全世界的浪漫，也是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独特展示。

ZXFK 史海拾贝

□ 陈显明

夔州怀杜甫

深远的文化底蕴。杜甫在夔州《夔州歌十绝句》其四里有这样的描写：

赤甲白盐俱刺天，
闾阎缭绕接山巅。
枫林橘树丹青合，
复道重楼锦绣悬。

柑橘树是美好的。杜甫通过观察柑橘树，写了多首赞美柑橘树的诗，颂扬柑橘树不仅在于外在形态美，更在于它的内在精神。他在《柑林》一诗中描写柑橘：“相携行豆田，开花霏菲非。”“经过倦俗态，在野无所适。”《写怀二首·其一》中评说柑橘：“用心霜雪间，不必条蔓绿。非关故安排，曾是顺幽独。”在《十七夜对月》中欣喜地赞扬：“茅斋依橘柚，清切露华新。”在《树间》一诗中感受到：“岑寂双柑树，婆娑一院香。”“江村意自放，林木心所欣。”杜甫徜徉在挺拔的柑橘林中，看到柑橘升立在广袤的天地之间，深深扎根于土地里，任凭什么力量也无法使之迁徙。那凌空而立的意气，“用心霜雪间”的坚毅神采，使他升起无限敬意。面对严峻的岁月，他以傲霜斗雪的橘树形象自况，橘树的精神，成了杜甫身处逆境、不改操守的伟大志士精神之象征。

杜甫在夔州近两年内，写诗四百三十余篇，占他全集诗中的七分之二，而且其中有不少的长篇，也不乏《登高》这样的杰作。夔州诗是杜甫用一生的血泪和忧思写就的。一词一句，都寄寓着无限哀伤和感慨。闻一多先生这样描绘晚年的杜甫：“他在风雨雷电中挣扎，血污的翎羽在空中缤纷的旋舞。他长号，他哀呼，唱得越急切，节奏越神奇，最后声嘶力竭，他卸下了生命，他的挫败是胜利的挫败，神圣的挫败。”

傅抱石是二十世纪中国画坛著名的艺术家之一。抗战期间，他住在重庆金刚坡，从古代题材入手，泼墨言志，书写豪情，弘扬民族精神，鼓舞军民团结抗战的决心和信心。

傅抱石于1904年10月生于江西南昌，1933年3月东渡日本东京帝国美术学院学习。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傅抱石根据《宋元明清书画名贤详传》，有意识地罗列明亡后身为遗民而不与清廷合作者46人，编译成《明末民族艺人传》，成为激发国人抗日战斗热情的利器。1938年4月，傅抱石应郭沫若之邀，前往武汉从事抗战宣传工作。

1939年4月，傅抱石携全家来到重庆，住在沙坪坝金刚坡。傅抱石在其“傅抱石壬午重庆画展”自序中，曾对金刚坡如是描述：“我住在成渝古道旁，金刚坡的一个极小的旧院子里……不得已，只有当吃完早饭之后，把仅有的几张方木桌，抬靠大门放着，利用门外来的光作画，画后，又抬回原处吃饭，或作别的用。这样，我必须天天收拾残局两次，拾废纸、洗毛笔、扫地抹桌子都得一一办到。”这期间，傅抱石有了一个全力画画的机会，常在画上题署“金刚坡下山斋”。

在此期间，傅抱石开始了美术史论的研究，以期通过学术研究来论证“中国美术的精神，日本是不足为敌的”，从文化艺术的角度鼓舞了国人的信心。1939年，傅抱石看到日本《改造》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日本美术的精神》的文章，他对其中有“圣战”的言论十分不满，撰写了《从中国美术的精神上来看抗战的必胜》，鲜明地提出“中国美术是‘日本美术的母亲’”，并指出“中国美术有三种伟大的精神：‘第一，中国美术最重作者人格的修养；第二，中国美术在与外族、外国的交接上，最能吸收，同时又能抵抗；第三，中国美术的表现，是‘雄浑’‘朴茂’，如天马行空，夭矫不群，含有沉着的、潜行的积极性。这三种特性，扩展到全民的民族抗战上，便是胜利的因素。”同年10月，傅抱石参编《文山先生全集》等书，编撰完成《文天祥年史》，宣传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慷慨悲壮的忠烈气节。后来，傅抱石还专门创作了《文天祥像》，上有沈尹默先生所书《正气歌》，颂扬其民族精神，鼓舞抗日军民的士气。

1942年4月，郭沫若创作的五幕历史剧《屈原》在重庆公演。该剧通过代表爱国路线的屈原与代表卖国路线的南后等人之间的戏剧冲突，鞭挞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合作抗战的行径，唤起国民的战斗情绪，挽救国家民族的危机，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热血青年、爱国之士无不受到鼓舞和激励。时年38岁的傅抱石看完此剧后，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祖国大好河山被强盗肆意践踏，同胞家破人亡，全国军民共赴国难，而国民党顽固派还在与中共的抗日部队搞摩擦，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屈原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深深地触动了傅抱石，他心潮澎湃，挥毫创作大幅国画《屈原行吟图》。他四易其稿，终于在同年7月完成大作。图中的屈原形象正如其《渔父》中五句诗所描绘的：“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将屈原的高洁情操、嶙峋傲骨以及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悲愤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携画卷找到郭沫若，请郭为画作题跋。郭沫若看后，心灵为之一振，称此画和历史剧《屈原》有异曲同工之妙，慨然于怀，文思泉涌，题写了38句五言长诗：“屈子是吾师，惜哉憔悴死。三户可亡秦，奈何不奋起。吁嗟怀与襄，父子皆凄凄。国难半英雄，拳路所经纪……百代悲此人，所悲亦自己。中国决不灭，屈子芳无比。幸已有其一，不望有二矣。”颂扬了屈原的爱国情操，表达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1943年9月，傅抱石创作了他的山水画代表作《巴山夜雨》，用李商隐名作《夜雨寄北》之意。他在题识中写道：“予旅蜀将五载，寄居西郊金刚坡下。近来霖雨淋漓，矮屋淅沥，益增旅人之感。昨日与时慧纵谈抗战后流徙之迹，因商量昔此图为纪念。”傅抱石借抒发山水之神韵，托物言志，期盼抗战胜利，期待和平生活的到来。

1943年11月，傅抱石与夫人罗时慧在金刚坡下咏读《楚辞》。当读到《湘夫人》中的“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之句时，二人相对无言，此时，日军的铁蹄肆意践踏沅水、澧水间的大好河山，心生痛恨外敌、苦念国土、心系黎庶之情，于是精心构思创作了《湘夫人图》。次年11月，郭沫若53岁寿辰，傅抱石携此画为其祝寿，因深得同时祝寿的周恩来喜爱，遂相赠。郭沫若于画左题七绝二首：“沅湘今日蕙兰焚，别有奇忧罹此君。独立伶仃谁可语？梧桐秋叶落纷纷。夫人矢志离湘水，叱咤风雷感屈平。莫道婵娟空太息，献身慷慨赴幽并。”既表达出对日寇罪行的愤慨，又将湘夫人比作慷慨献身的巾帼英雄，点明了画家为湘夫人画像的良苦初衷。

1943年12月，傅抱石又创作了《苏武牧羊图》。画面定格在汉朝将领前来迎接苏武归国的一幕：群羊之间，须眉染白的苏武手持汉节傲然而立，双目向天，显示出坚毅深沉的性格。《苏武牧羊图》赞扬了苏武忠心耿耿、不畏强权、威武不屈的民族气节，表达了坚持抗战必定胜利的决心和信心。

1944年9月，傅抱石又以诗圣杜甫的代表作乐府诗《丽人行》为题，创作了《丽人行》。画的是杨贵妃一行夜间出外巡游的奢华场面。他对这些奢靡浮华的现象深恶痛绝，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对国民党的腐败予以揭露和抨击，徐悲鸿赞此“乃声色肉肉之大交响”，一语点出此画真谛。

傅抱石在金刚坡住了近8年，他以金刚坡的山水与风雨为素材灵感，创造了独特的技法“抱石皴”，创立了自己的画风，迎来了他艺术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抗战胜利后，傅抱石和全家随学校迁回南京。新中国成立后，傅抱石开始迎接充满希望的新生活。



傅抱石的《屈原行吟图》(资料图片)